

冯雪峰与“左联”初期的几份刊物

□张丹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原名冯福春,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他下过田,教过书,与潘漠华、汪静之等组织过“湖畔诗社”。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开始了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奔波操劳的一生。从上海到瑞金到延安再到上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住过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领导过左翼文化战线,做过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保存过方志敏烈士从狱中送出的遗稿《可爱的中国》,找到了毛泽东流落上海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并托人将其带往法国转送苏联入学深造;派人护送斯诺前往延安采访,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始末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准确而系统的报道……

1929年10月,冯雪峰接受党组织委托,找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一事。任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直接下达的,冯雪峰一直清楚地记着当时所谈的两点内容:“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他也记得很清楚:“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冯雪峰《1928至1936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散参考材料》)

鲁迅接过了帅旗,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阵营即将诞生。从这里出发,冯雪峰密切配合鲁迅,开始了他对“左联”工作的倾心投入:他与冯乃超共同起草“左联”纲领,他化名“王黎民”为鲁迅整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他同王学文一起主持“左联”与“社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他又受“左联”、“社联”委托与王学文一起创办“现代学艺讲习所”;他为瞿秋白与鲁迅与“左联”牵线搭桥,

他推荐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他帮助丁玲筹办《北斗》,他在瞿秋白指导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特别是“左联”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刊物,更是不论其编者行列中是否写有他的姓名,都毫无例外地浸透着他的心血与汗水。请看:

1929年11月,冯雪峰开始编辑《萌芽月刊》,目的是为即将诞生的“左联”搭建一个出场亮相的舞台。后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刊登在该刊第3期上。可以说,《萌芽月刊》是“左联”的第一份没有明确为“机关刊”的“机关刊”。

《萌芽月刊》,月刊。1930年1月1日创刊。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光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同年5月1日出至第5期被查禁,6月1日的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改署新地社编辑,上海新地月刊社印行,仅出1期又被查禁。……创刊号卷末有《编者附记》云:“《萌芽月刊》是杂志,在内容方面不能不‘杂’。同时又不得不受种种的限制——除出现今状况的束缚,不能言所欲言,译所欲译的以外,还有同人等——著译者们自身的限制,就是人手不多,能力薄弱,又因为出身的社会层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思想或见闻或技能都不得不偏限于一方。所以《萌芽月刊》上的文章,除出‘杂’以外,一方面又不能免于或一的偏形。这被限定的我们底努力,在第一卷内,为主的是朝着这三方面:翻译和绍介,创作,评论。”

该刊由萌芽社主办,主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等国进步文艺、创作和评论并重,设有小说、剧、诗、散文诗、随笔、社会杂文、杂记、评论、研究、绍介、论文等栏目。鲁迅发表了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溃灭》译文连载,《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流氓的变迁》《“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等作品。主要作品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魏金枝的《奶奶》等小说。此外还有夏衍、张天翼、楼适夷、殷夫等撰稿人。

1930年3月,冯雪峰一边编辑《萌芽月刊》,一边着手协助鲁迅等筹办《巴尔底山》。据沈松泉回忆:“关于《巴尔底山》出版事务,都是冯雪峰来和我联系的。每期的稿子由雪峰送来,每期的清校样由雪峰带去经校对签字后又送回来。刊物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因为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刊物,在出版之前就估计到销路不会很多,而且随时有被禁止出版的可能……”

《巴尔底山》,旬刊。1930年4月11日创刊。鲁迅、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巴尔底山社印行。出版地上海。同年5月21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以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译文和评论,设有小说、戏剧、诗、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文艺随笔等栏目。鲁迅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等多篇杂感及《答北斗杂志社问》的重要谈话,该刊还发表了茅盾的《戏剧》、丁玲的《水》等重要作品以及钱杏邨、冯雪峰、夏衍等人的文艺评论。此外还有瞿秋白、白薇、阳翰笙、楼适夷、张天翼、穆木天、叶以群等主要撰稿人。

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的一切活动,几乎同时被取缔终止,“左联”的“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盾《关于左联》)。危难之际,冯雪峰挺身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之职。为了揭露屠杀者的罪行,为了鼓舞继起者的斗志,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于是立即写稿,找私人印刷所承印”。“烈士的照片是在冯雪峰的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两字由鲁迅手书后,将两字分开,分别找两处木刻工刻制,然后将这些秘密地运往冯雪峰、楼适夷、江丰等人的家中,一一敲印报头,粘贴照片,与正文装订成册。”(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刊物虽是秘密发行,却一下子销行了两三千份,犹如长夜弥天时惊雷炸响,其影响为编者们所始料不及。又经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传到了国外,“左联”与国民党的斗争,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为了纪念这一革命的合作,鲁迅携家属特邀冯雪峰一家同往阳春馆相聚。相片洗出后,又在照片下端亲笔题写了一行小字:“20,四月,1931,上海。”

《前哨》,半月刊。1931年4月25日创刊。鲁迅、冯雪峰编辑。发行者不详。出版地上海。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冯雪峰、楼适夷编辑。上海湖风书店发行。同年11月15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发表了“左联”决议、宣言、通告等许多重要文献。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登被害左翼作家的传略和遗著。

1931年5月初,冯雪峰去给茅盾送刚出版的《前哨》,在茅盾处意外地碰到了瞿秋白。瞿秋白认真地看罢“纪念战死者专号”之后,数日后向冯雪峰表示“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冯雪峰立即向鲁迅报告了这一信息。鲁迅听罢,“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

该期撰稿人还有鲁迅、谷荫、梁平、烈文、刘志清(柔石)等。

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的一切活动,几乎同时被取缔终止,“左联”的“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盾《关于左联》)。危难之际,冯雪峰挺身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之职。为了揭露屠杀者的罪行,为了鼓舞继起者的斗志,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于是立即写稿,找私人印刷所承印”。“烈士的照片是在冯雪峰的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两字由鲁迅手书后,将两字分开,分别找两处木刻工刻制,然后将这些秘密地运往冯雪峰、楼适夷、江丰等人的家中,一一敲印报头,粘贴照片,与正文装订成册。”(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刊物虽是秘密发行,却一下子销行了两三千份,犹如长夜弥天时惊雷炸响,其影响为编者们所始料不及。又经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传到了国外,“左联”与国民党的斗争,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为了纪念这一革命的合作,鲁迅携家属特邀冯雪峰一家同往阳春馆相聚。相片洗出后,又在照片下端亲笔题写了一行小字:“20,四月,1931,上海。”

《前哨》,半月刊。1931年4月25日创刊。鲁迅、冯雪峰编辑。发行者不详。出版地上海。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冯雪峰、楼适夷编辑。上海湖风书店发行。同年11月15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发表了“左联”决议、宣言、通告等许多重要文献。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登被害左翼作家的传略和遗著。

1931年5月初,冯雪峰去给茅盾送刚出版的《前哨》,在茅盾处意外地碰到了瞿秋白。瞿秋白认真地看罢“纪念战死者专号”之后,数日后向冯雪峰表示“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冯雪峰立即向鲁迅报告了这一信息。鲁迅听罢,“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

说:‘我们抓住他!’”(冯雪峰《回忆鲁迅》)此后的“左联”刊物上,就出现了“董龙”、“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生花妙笔,匕首投枪,有力地壮大了“左联”的声势和阵容。

冯雪峰在沟通了鲁迅与瞿秋白的联系,争取到瞿秋白参与“左联”领导之后,又征得组织同意,吸收丁玲加入“左联”,同时把创办一份机关刊物的任务交给了她。冯雪峰告诉丁玲,“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而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指示“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北斗》,月刊。民国二十(1931)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丁玲主编,蒋蓬子、沈起予助编。湖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民国二十一(1932)年七月二十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以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译文和评论,设有小说、戏剧、诗、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文艺随笔等栏目。鲁迅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等多篇杂感及《答北斗杂志社问》的重要谈话,该刊还发表了茅盾的《戏剧》、丁玲的《水》等重要作品以及钱杏邨、冯雪峰、夏衍等人的文艺评论。此外还有瞿秋白、白薇、阳翰笙、楼适夷、张天翼、穆木天、叶以群等主要撰稿人。

1931年年底,冯雪峰又与鲁迅一起创办了“左联”另一份机关刊物《十字街头》——一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只出版3期即被扼杀。

《十字街头》,半月刊。1931年12月11日创刊。鲁迅主编,冯雪峰助编。发行处不详。出版地上海。1932年1月5日出版的第3期改为旬刊,即被查禁。该刊以刊登杂文和诗歌为主,间有论文。鲁迅发表《沉滓的泛起》《知难行难》《友邦惊诧》等杂文,瞿秋白发表长文《论翻译》。此外还有李大、何明、林瑞精等撰稿人。

上述诸刊,从最早一种出生到最后一种完结,满打满算不过两年时间,每刊平均寿命仅为4个月(如果把《萌芽》与《前哨》的别名《新地》与《文学导报》也计算在内,则每刊的平均寿命只有3个月)。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报刊的监禁杀伐之严之烈,由是可见一斑。“左联”的书刊出版事业从一开始就存在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却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究其所以,鲁迅先生的亲执大纛、亲挥长戈自然是根本,而冯雪峰的不惧牺牲不辞辛劳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作为鲁迅先生的工作助手,他以卓越的执行能力把鲁迅先生的出版策略付诸实施,从而为初始阶段的“左联”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虽说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早已随岁月逐渐老去,但历史却终归不会忘记。他与鲁迅先生一起创办的《萌芽》等刊物,如今都以“文物”之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它们将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永远诉说着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蒋光慈与“左联”的生成

□杨洪承

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与现代作家的关系,自然第一位的是鲁迅,其次是华汉(阳翰笙)、茅盾、(沈雁冰)、冯雪峰、沈瑞先(夏衍)、钱杏邨(阿英)等。他们不仅仅是“左联”酝酿筹备过程中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成立后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骨干人员。将蒋光慈与“左联”联系在一起已经没有人提到了。充其量,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发展中,提及“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由来,一笔带过蒋光慈的功与过。

在蒋光慈(1901-1931)短暂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是与“左联”的生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左联”诞生的思想取向、文学史的转折尤其相关。蒋光慈(又名蒋光赤)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乡镇,1920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在莫斯科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文学趣味相投,结为好友,并从此开始真正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双重变奏的革命道路。他1924年回国,也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开始倡导革命文学,教书之余参与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在此时期认识了郭沫若。他积极参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积极复刊《创造周刊》,筹划了《创造月刊》出版,又办《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多刊物。1927年前后,他还与孟超、钱杏邨(阿英)、杨邨人等创办了春野书店,酝酿成立了太阳社。左翼文学的兴起,离不开蒋光慈这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他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文化》《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1929年初,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召开联席会议,蒋光慈到会并做了关于当前文艺运动的发言。此次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的“左联”筹备小组会议做了一定的准备。这年冬天,“左联”筹备小组会上蒋光慈介绍了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会上蒋光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也被常委会定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应该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夏衍、丁玲等革命作家进入“左联”不无相同。蒋光慈成为“左联”生长中的一名重要的革命先驱者不应该被遗忘。他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

首先,蒋光慈与“左联”气质相投。集文学家与革命者于一身的蒋光慈,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浪漫”构成了“左联”生成的重要生命元素,也是一场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精神资源。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实是一种精神气质。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等“左联五烈士”1931年为革命牺牲时均不到30岁,最小的殷夫只有20岁。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左联五烈士”时,也有相同的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满腔热情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热烈、态度认真”。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质呢。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汇聚了“左联”的精神源流,而蒋光慈是最早最直接坦白自己是“浪漫派”的左翼革命家。他说,“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日,一点心灵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这是1924年蒋光慈《新梦》诗集的自序。“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这样热情的呼唤,是1928年蒋光慈为《太阳月刊》创刊写下的“卷头语”。“我是中国人,我的命运已经把我与我的行踪注定了。”“我应当归去,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光明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1929年蒋光慈由苏联抱病回国又如是说。正是以如此浪漫的激情和理想,蒋光慈全身心地投入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初期建设,共同参与和筹划了“左联”诞生的全过程。

其次,政治与文学的冲突。蒋光慈与“左联”的冲突和矛盾,反映了一个特殊年代文学团体与政治的抵牾。“左联”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蒋光慈特点是,一方面他作为积极宣传革命新文学运动的上海大学教师,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中坚组织者,党的上海闸北街道第三支部的成员,联络后期创造社、南国剧社,筹备成立“左联”,以及“左联”成立后的刊物编务和各种其他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妻子吴似鸿后来回忆,那时“光慈在白天的工作,除了阅读,就是写稿”,“光慈在写作时,喜欢独自一个。如有人在他身边,他就写不出来,他马上把稿件藏进抽屉。”而郭沫若对他的印象是“光慈有一种奇癖。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他的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严格地说,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与此同时作家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矛盾日益激烈,革命情势的逼迫,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思想,放弃任何自我的得失。“左联”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对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和政策,蒋光慈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即革命队伍中流行“从事文学活动不

是革命”的认识,过分看重游行集会、撒传单等政治活动的倾向的反感。蒋光慈对其妻吴似鸿说“既然说我的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这一情绪带来的结果是,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一条新闻:

“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剧,蒋光赤遂开始动摇。”“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的起见,健全党内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省委批准。”从客观上了解,因长期的工作和写作的劳累,此时蒋光慈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先是患有胃病,后又患上了肠结核,到1931年再查出肺部结核已进入了第二期。他不得不需要休养。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蒋光慈正是因病未能出席。

蒋光慈对革命运动爱恨交加。他受到党内开除处分的理由,是他在革命高潮时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组织纪律的涣散,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严重问题”。按照当年冯乃超所说,“左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生成。其意义是“中国以至国际革命之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化”,“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深化”。显然,欲强加于蒋光慈身上的“动摇”、“浪漫”、“涣散”,虽有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但多有不实之词。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严重问题”之定量,更多更能够折射出“左联”在政治与文学中两难的生成困境。其一,蒋光慈无论《新梦》《哀中国》等的革命诗歌,还是《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咆哮的大地》等小说创作,都不无典型地代表了早期革命文学的实绩。钱杏邨是这样评价的:《新梦》“这一部诗集在当时的产生不亚于送出了‘世界革命’的信号,使左倾青年能以把握一条光明的出路。”而小说《少年漂泊者》“可以说是普罗文学的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革命时代的前茅’。”正是通过蒋光慈的这些创作标志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革命中的“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崛起。这何尝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目标呢!其二,蒋光慈的《野祭》《菊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雾的月亮》等小说创作,一方面被“左联”党组说成“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一方面这些作品一度畅销,有一批新文学作家积极的效仿,对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显然,面对“革命加恋爱”蒋光慈式的文学创作及其广泛的社会效益,当左翼革命文学刚刚兴起尚未有可供参考的样式,当作者自己还处于革命文学迷茫困惑时,曾借助小说主人公的口发问:“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呢,还是将笔丢下去拿起枪来?现在只有枪炮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吗呢?”(《菊芬》)而“左

联”以党的话语迅速对文学做出上述政治化的判定,是针对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之权宜呢,还是“左联”与文学家之间的无奈之举呢?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第一,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左联”既是文学与革命结合的产物,又是一批热血青年探索人生“精神热恋”的归宿。蒋光慈作为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身上许多个人的独特的生命经验,提供了“左联”生成过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精神元素。第二,蒋光慈退出“左联”既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又是文学组织社会化的必然。1931年蒋光慈被“左联”党组织开除,不是有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党的极左错误路线。作为党内领导的革命家瞿秋白也同时受到排挤,“左联”内被通报开除的也有郁达夫、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他们被开除的理由是“左联”面对残酷斗争必须保持高度统一和整饬纪律。第三,蒋光慈与独创了“左联”调和文学与政治矛盾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创作内容,或多或少是其人生和生活的缩影。但是,这些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中人的人生真实和对其人生、命运的自我。蒋光慈文学创作中某些简单、粗糙,甚至幼稚的